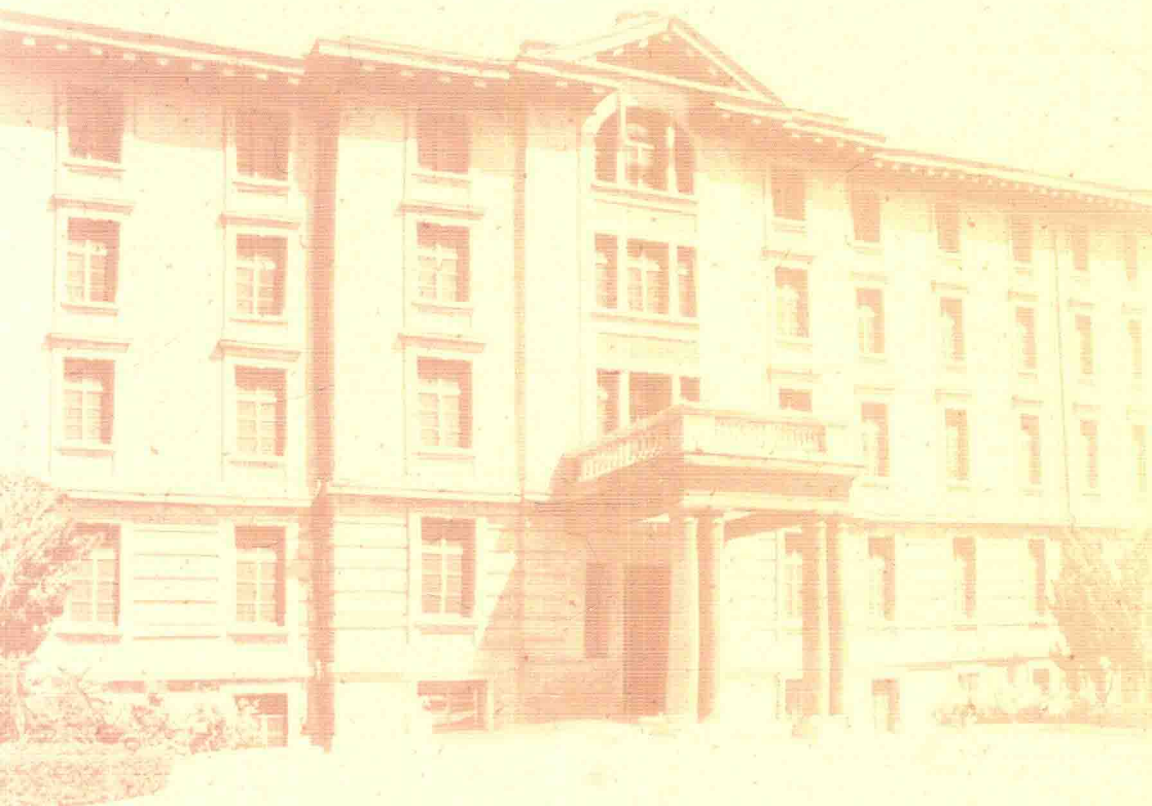




蔡元培时期 北京大学治理研究

张传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元培时期 北京大学治理研究

张传泉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研究 / 张传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3263 - 7

I. ①蔡… II. ①张… III. ①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IV. ①G649. 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356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铁楠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65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著作得到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才项目”资助。



序

值此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张传泉所著《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研究》即将付梓，我感到高兴而欣慰。通读稿本，我认为本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者立足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没有沿袭通行的结论，而是从相关历史资料入手，深入分析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基础和形成发展过程，高度概括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特点和成果，总体归纳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理念和原则。作者在研究中，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回忆录和研究文集，而且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研究”的结论建立在翔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

第二，作者还原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历史画面，这是本书的精彩之处。学界多认为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是“轻而易举”事情，其实不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充分发挥教授在治学和治校方面的核心作用，创立研究性社团和学术性刊物，调整学科设置和办学体制，这是“容易”之处；教授群体因立场不同而引发“新旧之争”“人事之争”“派系之争”，学生政治热情高涨而引发“拒约风潮”“学生自治”“讲义风潮”，学府与政府冲突而引发“索薪运动”“驱逐教长”，这是“不易”之处。面对这些“容易”和“不易”，北京大学在主动设计和被动调整中实现了新陈代谢。这些论述精辟独到，结合理性的学术判断，加深了对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认识。

第三，作者系统阐释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基本特点，这

是本书又一个亮点。该书贯穿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北京大学模式与东南大学模式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典范,北京大学“以德为鉴”,东南大学“以美为鉴”。本书主要从教育救国、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三个方面,探讨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是如何充分吸收德国大学观念。国外教会大学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模式,相较于教会大学,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深受国家大学法令的影响和制约。作者探讨了《大学令》《修正大学令》《国立大学校条例》和北京大学治理分合互动的关系。

第四,作者分析了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等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阐发了以蔡元培为主要代表的北大学人的大学治理观。蔡元培时期既是北京大学校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又是蔡元培一生中最出彩的时期。

在国家提出建设一批世界知名大学的目标任务后,如何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实现教育管理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挖掘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经验,对于推进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传泉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教师,既有扎实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教育学和哲学也有广泛涉猎。他多年来勤奋学习,刻苦研究,为人老实诚实,为学朴实踏实。我相信,以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出色的研究能力,在学术上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促进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康沛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论	(1)
一 选题缘由	(1)
二 选题意义	(3)
三 核心概念界定	(5)
四 研究综述	(8)
五 研究内容	(18)
六 研究方法	(21)
 第一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背景	(22)
第一节 政治环境	(22)
一 民主自由：政治和教育的一致追求	(23)
二 军阀政治：教育改革的挑战与机遇	(25)
第二节 思想文化基础	(27)
一 教育救国思潮的盛行	(27)
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30)
三 国外大学理念的传入	(33)
第三节 历史起点	(38)
一 京师大学堂时期	(38)
二 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	(41)
三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46)

第二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模式	(49)
第一节 发挥教授在治学和治校方面的核心作用	(49)
一 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50)
二 设立“教授治学”研究所	(54)
三 构建“教授治校”管理体制	(58)
第二节 营造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	(72)
一 创办研究性社团	(73)
二 发行学术性刊物	(77)
三 邀请学者名流来校演讲	(82)
第三节 调整学科设置和办学体制	(86)
一 调整学科设置	(86)
二 采用选科制	(90)
三 实行男女同校	(93)
第三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困局	(97)
第一节 教授群体中的纷争	(97)
一 “新旧之争”与陈独秀的离开	(97)
二 围绕教务长的“人事之争”	(101)
三 “派系之争”与胡适的出走	(105)
第二节 师生之间的矛盾	(112)
一 “拒约风潮”与校长学长的辞职	(112)
二 “学生自治”与学生力量的膨胀	(114)
三 “讲义风潮”与教职员的停职	(118)
第三节 学府与政府的冲突	(123)
一 “索薪运动”与北京教育环境的恶化	(124)
二 “驱逐教长”与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	(126)
第四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特点	(131)
第一节 两种治校理念和办学体制之比较	(131)
一 治校理念：以德为鉴和以美为鉴	(131)

二 办学体制：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	(135)
第二节 充分吸收德国大学观念	(142)
一 教育救国	(143)
二 学术至上	(146)
三 教授治校	(148)
第三节 与国家大学法令分合互动	(152)
一 《大学令》对北京大学治理的导向	(152)
二 《修正大学令》与北京大学独立探索	(154)
三 《国立大学校条例》对北京大学治理模式的 挑战	(157)
第五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成果	(166)
第一节 第一所现代国立大学	(166)
一 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	(166)
二 实现“教授治校”	(168)
三 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不断扩充	(170)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中心	(173)
一 文学革命	(173)
二 孔学批判	(176)
三 林蔡之辩	(177)
第三节 五四运动策源地	(180)
一 走上参政议政的路子	(181)
二 不忍制止的爱国运动	(182)
第四节 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基地	(185)
一 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86)
二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88)
第六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观	(193)
第一节 办学目标：“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 机关”	(193)

第二节	学科设置：“大学只需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	(196)
第三节	发展理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199)
第四节	组织结构：“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	(202)
第五节	价值取向：“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204)
第六节	外部保障：“教育事业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	(208)
结语		(213)
附录		(216)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6)

导 论

一 选题缘由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是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基石，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龙头，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责任重大、使命崇高。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①。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迅速提升，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是距离高等教育强国仍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方式和方法相对落后；缺乏学术大师和领军人才；在高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年11月20日。

校内部管理中,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弱化;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被定位成一种从属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独立行使自主权的空间。近年来,关于大学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学界涌现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北京大学还在实践中作了积极探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要建设一批世界知名大学,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一任务。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大学治理方面,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郭秉文、梅贻琦等归国留学生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以实现教育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和国际化为目标,主导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运动,众多一线教师和教育人士纷纷参与。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史上,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不是一个大学的现代化,但是没有哪个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史上的地位可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虽然北京大学的治理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但是没有哪个人在北京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可与蔡元培相提并论。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观念——“教授治校”移植于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得以成功治理,一跃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大学、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大学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尽管“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已成为历史,但是北大学人的治理观念和实践经验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被不同历史时期的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赞赏与借鉴。无论是蔡元培的继任者蒋梦麟,还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都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参照“昔日北大”。事实上,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的治理成果显著,至今仍令学者们津津

乐道。然而，这不是凭空产生的，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书旨在探究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背景、模式、特点，阐述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何以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大学、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总结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观及其对当下大学治理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只依靠经验的判断和感觉的认知，而需要历史的分析和学理的探究。需要说明的，本书部分内容直接取自当时政府的命令、北大布告、师生书函等文件，一些带有时代特点的词语在今天可能不习惯，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代替，只好照旧。

二 选题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大学扮演着不可替代、举足轻重的角色，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大学的通例。一方面，晚清民初，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不断变革，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腐败软弱的晚清政府到南京临时政府，再到后来的袁世凯‘洪宪帝国’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蔡元培见证了这些王朝的频繁更迭；并亲身经历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高扬‘民主’和‘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每一次社会政局的变化与震荡无不牵动着教育领域的变故与革新。”^①自成立之日起，北京大学就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就肩负着启蒙民智、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猛烈碰撞，相互融合，大学是

^① 吴炯：《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年，第6页。

一个“舶来品”，“乃直取欧洲之制度而模仿之”^①。蔡元培曾长期留学欧洲，学习和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影响。蔡元培曾说：“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②在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意图在北大建立起类似德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研究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

第二，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大学治理理论。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拥有大量教育学术论著和丰富的大学治理思想。蔡元培作为校长在北京大学治理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一系列措施首先都是由他率先提出。在蔡元培的旗帜下，北京大学会聚了蒋梦麟、胡适、陶孟和、俞同奎和谭熙鸿等一批拥有共同大学理念的学人。作为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教育家，他们对于教育事业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明确的目标，对于治理北京大学有着共同的认知基础。在北京大学治理实践中，北京大学人共同努力，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丰富的大学治理观。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培养学术人才，努力把北京大学治理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调整北大学科设置，确立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③；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倡导“教授治校”的理念，把大学治理的权力交给教授；实行学生自治，提出“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面对北洋政府的干涉，呼吁“教育独立”。这些系统的思想内涵丰富，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大学治理理论。

第三，有利于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参考借鉴。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④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且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今中

① 《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421页。

④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国大学内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行政力量过大。美国教育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在学术领域内，校长应该被看成是法官而不是执行官。校长没有被授权去按照他个人的意见去选拔谁是某一学科内最优秀的学者。他的任务是监督进行各种程序，裁定专家之间的分歧——简言之，就是在专家们多种多样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政策，或者采取特殊的措施。”^① 大学治理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还是大学领导和管理者不断探索的现实问题。要创造一流的大学关键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大学教授的作用，因为大学的学术工作主要是由教授们来承担的，大学教授才是学术创新的中坚力量。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的成功之道就是注重充分发挥大学教师的作用，建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教授治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区分开来，塑造和翼护了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驶上快车道，“教授治校”模式再次引发关注。研究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总结实践经验，有利于推动中国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三 核心概念界定

明确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治理研究，这里涉及蔡元培时期、治理两个核心概念。

（一）蔡元培时期

蔡元培（1868年1月—1940年3月），字子民，又字鹤卿，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大学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① [美] 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谢宗仙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他的最大贡献是开启了北京大学治理。蔡元培时期是指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期。蔡元培时期既是北京大学校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又是蔡元培一生中最出彩的时期。可以说，蔡元培改造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就了蔡元培。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10 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 5 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惊。”^①他所谓的“10 年有半”是指 1916—1927 年。1916 年 12 月 26 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告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 1 月 7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表就职演说。1923 年初，蔡元培因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行径而愤然离校。在此期间，除了 1919 年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短暂离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1920 年 11 月—1921 年 9 月蔡元培因赴欧美各国考察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外，蔡元培直接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即“5 年有半”。1923 年 7 月，蔡元培赴欧洲从事学术研究，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1926 年 2 月，蔡元培应北京政府教育部电促归国至上海，但由于京津地区发生战争，无法北上，后因胃病而留在南方养病。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 6 月，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但他在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校长。1927 年 8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京政府，他下令将北京大学等北京国立 9 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由教育总长刘哲兼任。至此，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被取消。总的来说，1916—1927 年是北京大学完整的发展阶段，蔡元培在留欧期间对校务仍然关注，多次致信蒋梦麟、胡适等北大学人，强调北大当“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蔡元培开启了北京大学治理实践，尽管他多次离校，但大学理念是一贯的，治理实践没有中断。

（二）治理

一般认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

^① 《蔡元培全集》第 7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8 页。

的管理机制，他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①。治理最初特指国家的治理，其实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治理问题，学校也不例外。大学治理理论同样来自美国学者，约翰·科森在《学院与大学的治理》一书中，将大学治理看作是“结构与过程的现代化”。后来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给大学治理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张维迎指出，大学治理主要是治理结构，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机制三个方面。^②肖应红认为，大学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它是大学内关于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制度安排。^③虽然“大学治理”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大学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

在本书研究中，大学治理是结构和过程的现代化，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大学治理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治理理论需要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来实现，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就是治理结构。通过制定各项具体的制度，发现并解决大学发展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有效应对校内外各种突发事件，从而实现大学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大学治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即大学由谁治理，谁参与治理，涉及校长、教师和学生。二是治理客体，即大学治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学科设置、学术风气、人才培养等校内事宜，还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三是治理机制，即如何治理，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机构，才能使大学治理结构符合各相关者的利益。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是西方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问题。大学的首要功能是创造、传授知识，而这一功能主要都是通过教师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教师群体在一个大学当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① [美] 詹姆斯·罗西瑙等：《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② 参见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③ 参见肖应红《关于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重建问题的思考》，《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9期。